

卢琳能脱口而出这场高校“隐形资助”的种种细节,比如每条补助细则、整套受助者筛选标准,甚至是上回资助发放的日期。但一个关键信息除外:作为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她在最初并不知道203名受助学生的姓名,但这恰是符合资助原则的。

今年9月开学后,在她工作的西安电子科技大学(以下简称“西电”),“学校用大数据悄悄往困难生饭卡里打钱”的消息在网上铺天盖地,其实距离西电第一次向困难生饭卡里打入720元补助已过去半年。

在河南省会的郑州大学(以下简称“郑大”),校园卡隐形资助10多年前已开始,期间也有院系辅导员提议,是否可向学生干部提供资助名单以便重点关注,但是提议因为“涉及受助学生隐私”始终没有通过。

“这些数据,其实一直都静静躺在学校信息中心的数据库里。”卢琳说。庞杂的校园大数据在精准资助名义下才被激活。

大变局正在发生。今年10月17日是我国第6个扶贫日,也是高校学生资助政策体系自2007年建立后的第13个年头。去年教育部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关于做好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指明了“精准资助”,并提出“坚持定量评价与定性评价相结合”。

不公示困难生认定名单、不用提交家庭贫困证明,一场保护困难生隐私和自尊的大数据隐形资助行动,在众多大学以各自的算法进行。

然而网络评论区对高校“大数据扶贫”的疑问也未曾停止:大数据真能筛出最精准的困难生吗?会不会有学生因为减肥、造假冒领等原因获得资助?每月100元上下的餐费补助对困难生的实际帮助大吗?

改变的起点

3元增量究竟能为大学食堂一餐饭带来什么改变?

这是西电大三学生黄旖收到校园卡资助后的一周,一直琢磨的问题,这笔720元补贴的资助标准是:一学期每天2餐,每餐补助3元。

在收到资助前,她的餐标是5元以内,在学校食堂几乎吃不上除了夹馍、鸡蛋饼等主食外一顿荤素搭配的正餐。但她谈及以前的餐食,没用过负面词汇,只说自己“爱吃,但更注重性价比”。

8元是补助后的餐标,不需多加节制就能在食堂窗口打到一荤两素。

收到隐形资助的学生浮出水面,大多因为善良“暴露”——卡里多了钱,他们最初以为是别的同学误充的,主动向辅导员澄清想要归还,黄旖也是如此。

9月25日19时黄旖去学校食堂吃饭,用餐高峰的人潮已散去。这个宿舍楼下的食堂是她最常光顾的,“大锅菜多,精品菜少,挺实惠”。

因为晚到,窗口菜少了,不少菜品被拼到一起售卖,菜也没了热气。黄旖不太在意,她仰头看价目表,盯了足足十几秒。

“这是没饭补前养成的习惯,很抠门儿,以前我会盯着价目表看更久。”黄旖说起以前她常会站在打饭的长队外犹豫许久,有时越看越急,索性拿塑料袋打个菜走了。

饭卡里每月多了180元后,她常去的是6元的套餐窗口,三素一荤的样式,口味差强人意,装餐食的是铝盘,不如8元套餐的白色餐盘精致。但这个窗口在用餐高峰期时也会排起长队,黄旖已不再觉得它另类。

校园有不少黄旖的禁区,比如校内两座商业综合楼大小不下百家餐馆,黄旖极少光顾,她还算熟悉的只有卖蔬菜面的档口,小份西红柿鸡蛋面10元,面汤免费。她说有“在家吃饭的感觉”,但也不常去,她只在低血糖犯时才去那里改善一下。

再比如她常去的学校图书馆里有家咖啡店,饮料均价20元左右。黄旖2年多来从没进过这家咖啡店,她在记者“请客进去喝一杯”的倡议下第一次进入。落座后,她向四处张望许久,见有人在自习,她自言自语了句:“这儿那么吵,为啥不在图书馆自习区学呢?不划算!”

她现在最坦然“奢侈一把”还是在食堂,偶尔点上一份10多元的石锅拌饭。

“学校食堂其实是人和人差距很小的地方了,我从大家的餐盘里看不出哪些人可能和我家境差不多。”一位坦承自己困难生身份的大二女生说。

公正的算法

如果肉眼看不出餐盘里的差距,那究竟什么可以?

西电信息网络技术中心的赵宇健老师在电脑里打开了“校园大数据决策支持平台”——答案就在这里。

要从大数据中淘出经济困难生,首先需要建立科学的量化指标。赵宇健把全校本科生2018年全年的消费数据调出,按早中晚3个消费时段把数据整合相加,获得了18.73万条

高校通过大数据寻找家庭经济困难学生,隐形资助伙食费

谁的饭卡里多了720元?

■本报记者 杨书源



▲9月25日中午12时左右,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食堂的用餐高峰来临。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食堂,获得隐形资助后学生用8元餐标可买到的食物。
质杨书源 摄

数据。结合学校平均水平,每月在食堂用餐60顿以上学生的消费数据是资助门槛之一,这是为了排除常叫外卖或外出实习的学生。

根据2018年西电学生消费水平统计,人均餐标是8元,学校把困难生小额消费标准定在了5元及以下。“5元是一个临界点,因为我们发现餐标在5元区间的学生和6—7元区间段相比,人数骤降。”卢琳说。

大数据最后筛选出每餐消费远低于平均水平的310名学生,小份西红柿鸡蛋面10元,面汤免费,她有144人在困难库,直接进入资助名单。

第二步就需要通过人工核实提升资助名单的精准度;学校通过深入学院、班级以及辅导员实地探访的方式核实不在困难生认定库的166名同学,避免出现个别学生因为减肥消费较低等造成资助结果偏差。

人工智能学院辅导员杨坤当时就负责再审核,他趁集体活动时锁定目标,漫不经心地和学生聊起胃口如何,是不是因为吃得太少才身体瘦弱……经过验证,他学院里那两位不在困难生库里的低消费学生是因为“胃口太小”,他建议从初选名单中剔除。在这次人工复查中,166人中有59人被核实为困难生。

而郑大的校园卡隐形补助在精准度上探索了更久,比如校园卡资助周期是1个月,每月统计前1年的消费动态数据,选择1000名消费数据最低的学生进行资助,这样可即时久,小赵本想每天吃馒头佐酱帮家里减负,但他那段时间的异常消费被大数据筛查了出来。

算法还在更新迭代中,比如在新学期资助开始前,两所大学都计划将学生校园卡绑定支付宝、云闪付产生的消费纳入统计。

家中度过困难期后,小赵的三餐消费恢复正常,补助也就自动停止了。此后小赵看到宿舍楼里有拎一袋馒头低头走路的同学,就会佯装轻松上前拍拍他肩膀问一句:兄弟,最近

怎么样?凭借这种方法,小赵真的“捕捉”到一位家中遭遇困难的同学,借了300元钱给他。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理解这一切。”小赵用过来人的口气说。

是咋了?凭借这种方法,小赵真的“捕捉”到一位家中遭遇困难的同学,借了300元钱给他。

“只有经历过的人才理解这一切。”小赵用过来人的口气说。

对抗标签化

其实没有谁比黄旖更懂得“被公示”带来的困扰。

她上高中时,学校把困难生的资格公示张贴在大门口,“每个人的名字被放得很大”,第二天班里一个女生跑到黄旖跟前,拉着她的手问:“你真的是困难生吗,我怎么看不出来呢?”当时黄旖没说话,苦笑一下走开了。

而另一位家境贫寒的同学获得了一笔4000元学院里的企业助学金。此后她经常被指点议论,甚至有人说:“这就是拿了4000元的那个人!”

“现在资助体系完善了,困难生面对资助的心态有所改善,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不在乎‘困难生’这个身份标签了。”卢琳说。

事实有迹可循,比如在西电上学期发放隐形资助的203名学生中,有59人是经过学院复查被发现的,原本不在困难生库里的。“说明有一小部分学生即使家境贫困,也不愿意主动让学校知晓。”卢琳说。

杨坤在一次暑期家访时意外发现,一位成绩拔尖学生家境很不理想,他询问学生为什么不申请助学贷款,回答是:害怕同学另眼相看。尽管再三疏导,这位同学在新学期依旧不愿提出困难生认定申请。

为了抚平困难生身份带来的焦虑,西电的助困活动常有“大费周章”的设计。比如有资助方为学校捐赠了几十辆自行车,学校在全校范围内进行了一次自行车慢骑比赛,在挑选参赛者时,除了吸烟范围普通学生更是通知了不少困难生。

比赛的结果是无论名次有人有奖。这样一场资助困难生自行车的行动也就转化成了人人可参与的校内运动赛。无人机试飞、单反摄影技能培训,甚至是去外省参观访学,这些本意向困难生倾斜的活动都以全校活动形式开放,尽管在人选上还是会暗暗偏向困难生。

学校资助中心也听到议论觉得在助困活动中放入少数

普通学生名额,是对困难生资源的侵占,但是老师们情愿背负压力,向学校争取更多参与名额。

不过也有的事需要“无为”。在西电每年出国交流的学生名额中,从不特设照顾困难生的名额,鼓励公平竞争。

在郑大,学校学生处处长刘超向记者说起过“提前设岗助学”的做法,也就是在经济困难的新生入学前,为他们设立勤工助学岗位,13年里受益学生已经有858名。“等到其他同学来校时,他们会展现出像学校主人的自信,家境带给他们的局促感就会消退。”刘超说。

黄旖也觉得进入大学后,自己对身份的焦虑在慢慢减退。大一入学,写家庭经济困难生认定申请,黄旖悄悄把表格掖在课本里,找个四下无人的时机拿出来写几句,现在写此类情况说明,她不需要躲闪了。

也偶有“隐痛”发作时,一次宿舍同学想要把所有打扫工具准备卧室和卫生间各一套,黄旖觉得浪费,有一套就够了,其他同学多有抱怨。黄旖一句话让气氛迅速降到冰点:“对,我穷!满意了吗?”

大部分时候,宿舍已有了默契,比如大家一块儿在微信群里约着出去吃饭,见黄旖过了许久没回复,就会主动换一家人均消费更低的餐厅。

直到现在,黄旖也说不上身边哪些人也是困难生,这个身份标签在这所大学正被刻意淡化。

何为公平

黄旖觉得自己也任性过——大二暑假,她参加了香港大学的暑期游学。

那年的游学项目有美国、新加坡等选择,香港的项目最便宜,加上学校补贴的游学经费,自费部分不超过2000元。即使如此,她还是犹豫了2天才告诉父母。

成行那周,大部分时间她都留在香港大学听课、吃食堂以节约成本。“我记得听专业报告时,全英文的有点难跟上,就尽量捕捉关键词。”听完高密度的英文报告后,回到宾馆是她的放松时刻,透过窗户可看到“维港一线海景”。

有一回,她在香港街头迷失了,手里拿着为朋友代购的东西。唯一为自己买的是杯网红奶茶,排了半小时队。一年后暑假,一位拿助学金的高中校友找黄旖咨询香港游学事宜,可校友最终放弃了,因害怕被同学质疑“困难生资格”。

一位大学辅导员曾和记者说起,他学院一位女生的确因为“困难生报名参加美国游学”被指摘。刚听到那位女生要去美国,群情激愤,不少同学每晚定时在校内论坛“炮轰”她。而这位辅导员觉得有失公允之处在于,当时根本没人在意这位女生品学兼优,本就符合学校选拔的游学人选。

风声在新学年的困难生认定工作来临前愈演愈烈。他找那位女生谈话,女生特别希望和大家澄清,他请那位女生写下情况说明,打算在新学年学院困难生认定会上代她解释。

“我坚信这次美国之行对我太重要了,我也确信它对我产生了巨大影响……”女孩在信里澄清了这次的自费支出,除去她勤工俭学以及奖学金积蓄,家庭负担的可能也不到1万元了,即使如此,她依旧自责不已。

那晚的认定会上,当大家听同行的学生说起女孩在当地只兑换了极少的美元,又说起她除了给亲朋买小纪念品没有任何消费时,全场沉默了。

“这就是他们真实存在的发展性需求,无论他们家境是否艰难。”郑大辅导员张晨曦说。

记者旁听过一场学院困难生认定工作会,会议一度陷入相同困境,一位申请人刚换了最新的苹果手机,同宿舍的人就手机是她自己买的还是亲戚送的讨论许久;还有位申请人喜欢手办玩具和电子产品,大家为他的爱好是否存在“过高消费”争论不下,后来证实他的手办不超过200元,而电子产品也是淘来的二手货才平息。

在郑大,一位接受过隐形资助的医学院女生让人印象深刻。她的着装简约却不失精心;微卷的长发、宽松的卫衣,丝毫没有生活拮据的烙印。女孩打趣说:“我擅长用最少的钱过上体面生活。”

当下大学,困难生该以什么面目出现?任何概括都有失公允。清晰的事实是:在这两所大学,收到隐形资助的还是困难生中的少部分。“我们隐形资助的学生人数,接近特困生人数,许多一般困难生不在其中。”郑大学生处的魏东老师说。

“更多时候他们的缺口并不在3元餐补。”卢琳说起在西电每位同学每年可向学校申请2000元无息贷款,用于创新创业等发展性需求。

承认家境贫寒的学生需要更多发展的可能性,对他们的多元选择有更多认同,或许这只是公平的开始。黄旖始终没对记者放下戒备心,反复确认隐私信息不会刊登,而且一直没向记者开放微信朋友圈。

“最好的坦白能让和我处境相同的人拥有生活的勇气”,黄旖希望她是“暴露”在大数据算法密林之中的少数人,“一切都继续悄悄进行”。(文中受助学生及困难生均为化名)

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

(上接第1版)黄坤明指出,习近平主席贺信提出的理念主张,充分体现了对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对增进人类共同福祉的高度关切,展现了中国与世界各国携手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的真诚愿望。

黄坤明强调,今年是新中国成立70周年、互联网诞生50周年,在新的起点上,应当牢牢把握发展机遇,积极应对风险挑战,把网络空间建设成为造福全人类的发展共同体、安全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要坚持平等互利、包容互信、团结互助、交流互鉴,大力发展数字经济、释放数

字红利,有力维护网络空间安全秩序,让互联网成为促进变革创新、实现互利互惠的合作共赢之网。面向未来,中国将一如既往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努力做网络空间发展的贡献者、网络空间开放的推动者、网络空间安全的捍卫者、国际网络治理的建设者,与国际社会共同推进全球互联网发展治理进程,更好造福世界、造福人类。

黄坤明还会见了出席大会的重要嘉宾,参观了“互联网之光”博览会。本届大会以“智能互联 开放合作——携手共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为主题,8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0名嘉宾参会。

加快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

(上接第1版)“虹桥国际经贸论坛”将更名为“虹桥国际经济论坛”,合作单位将增加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和国际贸易中心。

应勇表示,为了进一步放大溢出带动效应,上海制定了7方面50条举措,正在推动落实。我们要加快建设虹桥进口商品保税展示交易平台等功能性平台,把上海打造成联动长三角、服务全国、辐射亚太的进出口商品集散地。进博会期间,我们还将举办上海城市推介活动,进博会后,国家展将向公众延展8天,以满足广大市民的观展愿望。

上海稳增长目标不变

有记者问,在当前国际经济下滑、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背景下,上海有没有对策加大引资力度?

应勇回答,我们坚持集中精力抓经济,心无旁骛促发展,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把稳增长放在突出位置,努力用稳增长的任务落实好促发展的硬道理,用自身发展的稳定性来有效应对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有效应对经济下行的压力。

应勇说,今年以来,上海经济运行呈现企稳回升的好势头,前三季度全市GDP增长6%。今年以来工业投资的增长在去年增长17.7%的基础上又增长了16.3%,连续18个月保持两位数增长。去年,新设外资企业项目、合同利用外资、实到外资都同步实现增

长,今年1月至9月仍保持“三个同步增长”,分别增长了40.2%、8.9%和13%。

应勇表示,不管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如何不确定,我们稳增长的目标不变,我们自身发展的稳定性不变。经过不懈的努力,我们有信心完成今年全年的经济增长目标。

加快垃圾末端处置建设

有记者问,《上海市生活垃圾管理条例》实施成效如何,下一步如何提高垃圾末端处置能力?

应勇回答,上海生活垃圾全程分类的体系已经初步建立,全市居住区垃圾分类达标率从去年底的15%,提高到今年9月的80%。经过努力,到9月底,全市每天分出可回收物比去年底增长5倍,分出湿垃圾比去年底增长130%,分出干垃圾比去年底减少26%,分出有害垃圾比去年增长5倍。现在全市每天的生活垃圾资源化利用量为1.7万吨,比2017年底提高了41.7%,而填埋的比例下降到30%以下。

应勇表示,加快生活垃圾末端处置设施和功能性利用设施的建设,这是在上海当下远比多建几幢楼来得重要。近两年,上海持续加大垃圾末端处置设施和“两网融合”体系建设的投入,这才有了生活垃圾填埋率的下降。我们要加快资源化利用末端设施建设,目标就是到2022年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

“在这里,我要为上海市民点赞,向上海市民表示衷心的感谢。”应勇说。

(上接第1版)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改革开放是必由之路,必须坚定不移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中国的改革开放大大推动了中国现代化、国际化城市的迅速崛起。当今世界,只有拥抱经济全球化、融入经济全球化,推动经济全球化,才能更好更快地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中国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上海实现了从传统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封闭半封闭向全方位开放的重大转变,生产总值从273亿元提高到3.27万亿元,人均GDP从1445美元提高到超过两万美元,正在成为当今世界最具影响力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之一。上海能有今天,靠的是改革开放;上海要有更高的城市能级、更强的经济竞争力,还要有更深层的改革、更高水平的开放。当前,我们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在办好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的同时,全力实施国家交给上海的三项新的重大任务,即增设上海自贸试验区临港新片区,在上交所设立科创板并试点注册制,实施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战略。这是上海在更高起点上推进改革开放,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重大机遇,我们要举全市之力,力争尽快取得有显示度、有影响力的实际成效。

应勇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创新是根本动力,必须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城市竞争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城市创新能力,上海已经到了不创新就不能大步前进的发展阶段。我们大力推进创新驱动发展、经济转型升级,加快向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进军,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上海全社会研发投入支出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从0.5%提高到超过4%,在沪各类研究机构从153个增加到2923个,其中外资研发机构452家,国家重点实验室等国家级研发机构85家。我们要继续把教育放到更加优先发展的位置,把创新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切实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努力使上海成为全球学术新思想、科学新发现、技术新发明、产业新方向的重要策源地。

应勇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增强资源配置能力是关键所在,必须坚定不移提升城市集聚辐射能力。集聚高能级功能性机构,配置全球高端资源要素,是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的必然要求。配置资源更多、辐射半径更大、枢纽平台作用更强、话语权更大,是国际大都市的

上海发展重大机遇也是企业的机遇

普遍追求,也是上海的不懈追求。作为中国最大的经济中心城市,目前上海金融中心在全球金融中心指数排名中名列第五,口岸货物进出口总额居世界城市首位,集装箱吞吐量连续9年排名世界第一,跨国公司地区总部超过700家。我们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进一步推动经济要素的高效流动和高效聚合,使上海成为全球资金、信息、人才、货物、科技等要素流动的重要枢纽节点之一,全面提升上海在全球城市体系中的影响力和竞争力。

应勇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提高经济密度是基础支撑,必须坚定不移推动质量变革、效率变革、动力变革。著名国际大都市无一例外,都是高产出、高密度的城市。这是大城市资源要素高度集聚的特点决定的,也是城市发展的重要规律。上海要成为国际经济中心城市之一,必须牢固树立新发展理念,在提高经济密度上下更大功夫。这些年来,我们每年低效建设用地减量8平方公里左右,淘汰落后产能1000项左右,工业园区每平方公里土地产值从2008年的58亿元提高到目前的75亿元,单位生产总值能耗从1985年的每万元5.47吨标准煤下降到2018年的每万元0.38吨标准煤。我们还要进一步加强各类资源的优化布局和合理配置,努力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城市,以更低的能耗、更少的土地等资源消耗,支撑更高质量、更有效益的经济发展。

应勇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文化软实力是重要内涵,必须坚定不移地建设国际文化大都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核心资源之一,也是城市吸引力、创造力、竞争力的重要体现。我们相继建成了中华艺术宫、当代艺术博物馆、国际舞蹈中心等一批地标性文化设施,还将建设更多地标性文化设施。我们相继举办了上海国际电影节、国际艺术节、F1方程式锦标赛、ATP网球大师赛等一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体活动,拥有了243个公共图书馆、138个博物馆、81个美术馆。我们要努力让海纳百川、追求卓越、开明睿智、大气谦和的城市精神,让开放、创新、包容的城市品格深深植根于上海的肌体和血脉之中。我们渴望未来的上海,建筑是可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尊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

应勇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生态环境是重要保障,必须坚定不移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提升城市竞争力。这些年来,上海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以更大力度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推进绿化建设和生物多样性,环保投入相当于全市生产总值的比例保持在3%左右,PM2.5平均浓度从2013年的62微克/立方米下降到2018年的36微克/立方米,今年1—9月为34微克/立方米。人均绿化面积从新中国建国初期的“一双鞋”扩大到目前的“一间房”,即从0.132平方米扩大到8.2平方米。我们正在加快推进生活垃圾分类,希望用五年左右时间在基本解决垃圾综合治理问题,到2022年实现原生生活垃圾零填埋。我们还要持续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加快建设天更蓝、地更绿、水更清、生态宜居城市,让城市更有序、更安全、更干净。

应勇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改善民生是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必须坚定不移创造更高质量生活。我们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快构建全覆盖的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和社会保障体系,不断提升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不断提高人民生活质量和水平。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上海城镇和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166倍和103倍,城镇居民人均住房面积从7.4平方米提高到37平方米,人均期望寿命从73.35岁提高到83.63岁,在沪高校从45所增加到64所。我们持续改善民生,让人民群众有更高质量的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

应勇说,提升城市能级和核心竞争力,优化营商环境是重要标志,必须坚定不移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营商环境是城市重要的软实力,也是城市极其重要的吸引力、创造力和竞争力。这些年,上海深入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率先打响“一网通办”政务服务品牌,大力营造法治化、国际化、便利化的营商环境和公平、统一、高效的市场环境,助力中国在世界银行营商环境报告中的排名大幅提升。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我们要对标国际最高标准最好水平,全面建设以政府服务“一网通办”为重要标志的智慧政府,打造国际一流营商环境,不断提高市场主体的满意度和获得感。